

再论教学改革中的理念和技术问题

——兼答朱文辉博士之“商榷”

周序¹ 刘茜²

(1.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软件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教学技术不是外在的规定或固定的流程,而是内化在教师身上的各方面教学素质,这些素质可以通过模仿优秀的教学案例来获得。理念需要通过技术来落实,因而技术上的“可望达成”是判断理念是否合适的重要依据。如果理念太过超前,技术难以望其项背,那就暂时没有推广的价值。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偏重于理念推广而忽视对技术的探索,这也导致实践中所谓的技术研究仅仅是零散经验的总结,无法支撑理念的落实。这要求教学改革必须转向,从片面推广理念转到相对重视技术的路子上来,这样方能使理念和技术能够相互协调,共同促进教学改革的良性实施。

关键词: 教学改革; 教学理念; 教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8)01-0114-07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于2015年第4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中国教学改革亟待转向》^[1]。编辑部老师告之有读者投来一篇商榷性文章,希望笔者能就此回应一下。盛情难却,只得奉命。但自知文思浅陋,也不敢轻言“商榷”,不过是将《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一文中的某些观点略作澄清,聊以复命而已。

一、教学技术的内涵及其意义

笔者和朱文辉博士的分歧,关键在于“技术”二字。笔者主张教学改革应更多地关注技术提升,而朱博士则持相反意见。那么,什么是“技术”?“技术”到底在教学改革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朱博士写道“从周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读出,其所谓的技术研究,其实就是‘操作层面上可供教师参考和模仿的案例’或者是‘备课—上课—评价这样的固定流程’。”^[2]可见朱博士将笔者所说的“技术”理解成了一个固化的范本或给定的流程,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技术包含流程设计,但不限于此,

更不是给定的、教师们只能照章执行的套路。洛克主张的“教导儿童的主要技巧是把儿童应做的事也都变成一种游戏”^[3]、杜威强调的要重视“提问的艺术”^[4]以及苏霍姆林斯基建议的“怎样训练儿童流利地书写”“识字教学应当跟图画紧密结合起来”“怎样听课和分析课”^[5]等等,都是教学技术。巴班斯基讨论了教学形式的选择、师生交谈风格、提问与启发、不同类型的作业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渠道^[6]。另外,像教学语言应该怎样才能做到“随时随地都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保证学生一边专心听讲一边还能够主动地思考而不是被动静听”^[7],以及小组合作当中怎样分组最为合适,怎样保证各个小组的学生都能积极参与,怎样让每个小组的报告都能得到其他小组的重视等一系列问题,也都是教学技术。教学技术是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绝非朱博士所理解的“固定流程”那么简单。

那么,技术是不是“可供教师参考和模仿的案例”呢?技术显然不是案例,但案例却可以是技术的来源。通过对优秀案例的模仿、借鉴,教师能够获得

收稿日期: 2017-10-1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大学课堂生成性教学研究”[FJ2016C057]

作者简介: 周序,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博士。

或者提升自己的教学技术。朱博士对“模仿”嗤之以鼻。他以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为例,指出很多模仿洋思、杜郎口的学校,最终都落了一个邯郸学步的下场。这倒的确是实情。但若以此作为反对模仿的根据,在逻辑上还存在着瑕疵。通常我们说一个案例“可供模仿”的时候,我们默认的是这个案例是好的、对的、先进的,一个落后的或者存在明显问题的案例显然谈不上“可供模仿”。洋思中学的办学理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本就不符合教学常识,其采取的“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至多也只能说有助于应试,而不能说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模式;而杜郎口中学的“10+35”(教师讲解少于10分钟,学生活动大于35分钟)、“0+45”(教师基本不讲)等教学模式的效果也言过其实,往往还是弊大于利。可见,这些案例根本就不能说是好的、对的、先进的案例,而是本身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模仿一个存在问题的案例得到了坏的结果,问题的根源便不是该不该模仿,而是模仿的对象是谁。

模仿好的案例则相反。在小学数学中,“线的认识”是一个教学难点,俞正强老师甚至一度将其列入公开课的“黑名单”。但后来俞正强老师找到了“线无粗细”这么一个突破口,先让学生用粗细不同的笔来画同一条线,再让学生确认所画出来的这些粗细有别的线其实都是同一条线,最后得出“笔有粗细,线无粗细”的认识^[8],从而使这一“黑名单”中的课成为自己的经典课、“种子课”^[9]。很多教师在模仿、借鉴这一教学思路的时候,都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当然,他们的模仿也绝非朱博士所说的“死记硬背的机械教条”^[2],而是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迁移、突破、创新。例如,这一教学案例完全可以迁移到“点无大小”“面无厚薄”等知识内容上,从而使相关的问题都能按照类似的思路得到解决。杜威说:“我们对经验怎样前进有个观念,就能给我们指明为了使经验能比较成功地前进,必须具有什么因素,或改变什么因素……我们就有一套程序方法或技术。”^[10]在这里,“可供模仿的案例”就是杜威所说的“经验怎样前进的观念”。利用这些经验并加以整合,就提升了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技术,进而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是在技术上进行“模仿”的价值所在。

在各种“新理念”大行其道的今天,笔者也并非唯一一个强调技术的人。不少学者都呼吁教育研究要进行“实践转向”。“对理论工作者来说,如果因提出了某种符合实践需要的理论、规划了某项成功的教学改革而沾沾自喜,认为选对了路子、跟上了时代,实际上他仍然是实践的旁观者,并未能真正介入

实践。”^[11]黄仁宇先生更是提醒我们“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枝末节内提出。”^[12]技术是否高于道德或许仁见智,但任何道德的实现,也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方案,必须表现为具体的行为。理念也是一样,理念是方向性、目的性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才能落实。以跑步为例,如果理念是“跑出最快的速度,获取金牌”,那么刘翔就需要掌握起跑、途中跑、冲刺跑、跨栏等技术。这些技术掌握得越好,获取金牌的机会就越大。刘翔在悉尼奥运会之后将跨栏技术从八步跨栏改为了七步跨栏,其实就是一个技术上的调整,这一技术的革新帮助刘翔在2011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中获得冠军,这无疑技术促进理念落实的生动诠释。关于这一点,其实朱博士应该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朱博士和笔者商榷的三篇文章当中,都有类似“几经拜读周文,我们收获良多,但……”这么一句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商榷技术的运用。这一技术的运用可以让商榷性的文章既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对方观点的不认可,也礼貌性地肯定了对方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一定价值的,从而使“委婉、礼貌地表达不同意见”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跑步如是,写作如是,教学技术亦同此理。金宏老师在讲解余光中的《乡愁》的时候,有学生故意捣乱一般地发言道“长大后,乡愁是一张张人民币,毛泽东在里头,笔者在外头”,引起全班同学的一阵哄笑。金宏老师临危不乱,借机和学生谈起了返乡农民工的血汗钱的问题,不但成功地化解了课堂危机,还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情感教育^[13]。但金宏老师显然没有生搬硬套某个案例,也并非遵循了什么固定的流程,而是依靠自身随机应变的能力、语言引导的艺术来处理这一教学意外。所以说,教学技术不是一个外在的标准或者固定的框架,哪怕是通通过模仿而获得的技术,也需要内化到教师身上,成为自身素质之一。总而言之,内化在教师身上的语言表达、随机应变、游戏设计、活动安排、危机处理等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就是教学技术。具备较高的技术,我们在落实某些教学理念的时候就显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如果技术掌握得不到位,就可能把“讲授”演变成“灌输”,把“对话”变成“闲聊”,把“生成”异化为“伪生成”,这显然不是教学的福音;缺乏高明教学技术的老师,在落实理念的时候还会显得战战兢兢、瞻前顾后,甚至陷入生搬硬套、机械

模仿的怪圈,成为朱博士所不屑的“匠人”“机器”以及“传声筒”^[2]。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上的模仿和进步,也是朱博士所说的“人要求变”的思想^[2]的重要体现。

二、技术是对理念进行筛选的重要标准

技术并不排斥理念,教学工作也离不开理念的指导。不过,理念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适合的也有过于超前的。在用理念来指导教学工作之前,需要先对理念进行甄别,而技术恰恰是对理念进行甄别、筛选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一个先进的理念如果同时还有得以落实的具体方案、技术,那么这个理念就可以用来指导工作的开展。不过朱博士的观点显然比笔者要更加激进得多。他说“改革不同于做饭,要等到所有的配料准备齐全才能启动”^[2],而是可以在技术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理念革新来“化腐朽为神奇”。顺着这个逻辑,他认为笔者提出的理念在推广前必须首先考虑技术问题的观点“就需要进一步的斟酌了”^[2]。不过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朱博士所抨击的,其实也并非笔者所倡导的。笔者从不认为改革必须等技术完全准备妥当之后才能进行。笔者在《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一文中写得很清楚“某种教学理念的推广,必须以技术上的‘可望达成’为前提。这就好比在教给儿童知识的时候,知识的难度应该落在其‘最近发展区’之内;同样道理,教学理念的推广,也必须是一线教师在教学技术上可以达成或者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1]所谓“可望达成”,意思是现在还没有达到,但差距并不大,通过努力完全有可能实现,这就对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刺激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改进和提高技术提出了要求,是促进教师进步的体现。

我们可以通过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对比来理解什么是“可望达成”。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空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生产技术尚不发达,法律体系也并不健全,既无法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足够充足的物质资料,也不能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大同社会”般的理想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显得太过超前。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根本难以望理想之项背,理想就只能成为“空想”。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法律体系也逐步健全,我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优点借鉴了过来,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

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虽然还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创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是“可望达成”的了。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才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选择。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信条的现实体现。而笔者所说的“技术水平决定理念选择”,其实遵循的也是类似的逻辑。

那么,面对当前教学改革中的众多新理念,一线教师在教学技术上的准备是否已经做到了“可望达成”呢?其实朱博士自己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朱博士叙述了他在给一所学校做“讲座之前,讲座主办方一再嘱托‘要紧贴实践’‘要有操作性’‘要多举例子,给出示范’。”在讲座后和教师交流时,不少教师还向朱博士请教,“‘我们学校存在×××样的特殊问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您能帮助我们设计出具体操作的步骤、程序或相对应的模式吗?’”^[2]种种这些,或许多少也存在着朱博士所批评的“技术至上”的影子,但背后的根源恐怕在于一线教师在技术准备方面还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因而根本不知从何落实当前推广的众多新理念。当不断有教师感慨“也许他的理念是对的,但没有一个学校能‘忠实’实现他的理念”^[14]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教师抱怨说“新课程改革已经让我们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15],我们需要做的,就不应该是一味指责“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2],而是冷静反思我们对教学技术的研究和准备到底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

当某个理念太过于超前,已经超出了技术上“可望达成”的这一前提,那么理念的落实就必然会步履维艰,甚至导致对理念的怀疑和不信任。比如“多元评价”理念,如果要用到选拔性考试当中,就必须首先解决需要增加哪些“元”、不同评价主体之间的权重划分以及价值关系协调等问题,还要防止多元评价成为教师、学生、家长“以权谋私”的工具。“多元评价”理念已经提出多年,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未能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甚至很难乐观地预估说不久之后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多元评价”对于选拔性考试来说就是一个太过超前的理念,它不具备技术上的“可望达成”这一前提。这也导致中考、高考坚持以阅卷人的打分高低为唯一依据的情况始终未有改变,教师、家长、同伴、学生本人的评价结果也长期未能纳入其中。2014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也只是强调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招生

录取的重要参考,而没有将“多元评价”写入其中,或许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理念显得太过于“乌托邦”了。

“教学回归生活世界”也是如此。且不说这一理念本身尚存争议^[16],仅就技术准备而言,也还远未达到“可望达成”的地步。如果要让教学回归生活世界,那就需要让老师知道如何回归、回归到哪里去,回归的路径、方式是怎样的。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在学术界,关于“回归技术”的研究都往往语焉不详,教学一线也难免将这一理念落实成了“教学联系日常生活”,例如创设生活情境、从生活中挖掘素材等^[17];乃至“用生活取代教学”,例如在数学课的重点不是计算西瓜瓤占整个西瓜的体积比例,而是和学生交流在不同家庭、不同季节买什么样的西瓜更合算^[18]。因而,说“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太过超前的理念,这一判断应该是中肯的。至于“素质教育”“学生中心”“自主学习”“先学后教”等理念,也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便是朱博士所推崇的“生成性教学”理念,从大大小小的实践案例来看,也是“伪生成”多于“真生成”,“乱生成”多于“有效生成”^[19],以至于连一些生成性教学的倡导者都不得不承认很多教师“对其操作还是一头雾水”^[20]。因此,这些理念是否适合在实践当中全面铺开、广为推广,还需要慎重考虑。

总而言之,理念本身固然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但技术上是否做到了“可望达成”,则应该是我们选择一种用于指导实践工作的理念的重要标准。如果在选择指导理念的时候只考虑其是否够“新”,就容易陷入“理论实践两张皮”的困境;只有在技术上的“可望达成”这一前提下筛选出来的理念,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

三、技术的发展应跟上理念更新脚步

“理念不能脱离实践”是教学界的一个共识。《光明日报》曾形容过“素质教育”理念“理论口号一大堆,名词概念漫天飞,经验总结立马有,就是不知实践怎么走。”^[21]而且这一局面至今未能有所改观。这就是“理念脱离教学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朱博士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是“实践脱离了理念”,“不存在对教学‘技术’关注不够的问题”,反而是对教学理念“还远远欠缺关注,还需要不断加强、深入研究”^[22]。究竟是理念太过超前,还是技术已经远远领先,看来还需要做一番谨慎的比较。

为什么朱博士会觉得实践脱离了理念,对技术

的关注已经过多了呢?他在文中颇为“怨念”地说:新理念的提出只不过是个别学者的“偶……冒大不韪”之举,“很多学者选择了三缄其口、默不做声”,新理念在实践当中的影响也只不过是“轻轻地在实践的表皮掠过一阵风,而后便如‘过鸭背之水’,鲜少留下痕迹”^[2]。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说“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领先”“需要加强理念研究以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就显得理所应当了。

但作为新理念的代表者和拥护者,朱博士显然是太过于“自谦”了。放眼观之,近年来,各种新的教学理念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核心素养、翻转课堂、先学后教、多元评价、生成性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纷纷走进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理念在教学一线也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教师们早就可以开口学生中心闭口建构主义了;先学后教的教学模式在很多学校也都进行了探索“核心素养”甚至被写入了很多地方的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当中;呼吁“更新理念”“转变观念”的专著、论文、讲座也比比皆是;不少教师虽然对一些新理念仅仅是一知半解,哪怕都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也被要求在实践中进行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事实,或者认为这些事实并非理念的普及和推广的体现,那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各种理念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而让广大教师不断学习、接受和探索运用各种新理念,则是教学改革中的常态。

如果非要说种种理念在实践中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也只能从效果层面来理解。由于缺乏相应教学技术的支撑,某些理念的落实效果并不算好。学生中心经常演变为学生主宰和自由散漫,建构主义成了什么都对、什么都好,生成性教学更是容易沦为“伪生成”“乱生成”……凡此种种,让不少教师对某些新理念从最初的新鲜好奇,到感到困惑无奈,再到恢复于原样的麻木惫沓^[22]。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新理念在实践中缺乏拥趸者,倒也符合实情。新理念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国外的研究中也不乏类似结论。保罗·基尔希纳等学者对关于建构教学、发现教学、问题教学、体验教学和探究教学等理念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最终的结论是这些理念“不管用”,无益于学生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3]。即便我们退一步说,不是这些理念“不管用”,而是“没用好”,没有找到落实这些理念的正确途径和方法,那至少也说明了技术发展落后于理念更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效果并不理想的时候,广大教师自然会对理念产生抵

触情绪,从而拒绝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这样看来,某些太过超前的理念如果真的“如‘过鸭背之水’,鲜少留下痕迹”,倒不失为一件幸事。

如果我们承认“技术发展滞后于理念更新”这一事实,那就必然需要对当前的教学改革方向进行调整,使改革从“继续更新理念”转到“加强对技术的重视”的方向上来。关于这个观点,笔者在《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这篇文章中其实写得很清楚“教学改革亟待转向。”^[1]但朱博士将笔者的这一结论理解为笔者在“随便叫停”教学改革^[2],并进行了犀利的抨击。笔者很能理解朱博士的这种心态。毕竟关于课程教学改革,尤其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观点,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派系、纷争,以至于关于改革的一切话题似乎都变得非常敏感,任何对改革进行质疑,哪怕仅仅是试图进行调整、改进的思想,都容易被理解为“反对改革”“不思变通”,有时甚至被贴上“保守主义”“开历史倒车”的标签。可以想象,将笔者说的“改革应该转向”理解为“叫停改革”或者“反对改革”的,朱博士或许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唯一一个。因此,究竟什么是“转向”,是否应该“转向”,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其实所谓“转向”,意思是前进的方向变了,但前进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滞下来。就好像一个司机转动了方向盘,汽车自然就“转向”了,但我们却不能说车辆停下来了。即便是对“新课改”一直持反思、批评态度的老一辈教育家王策三先生,也认为“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必须改革”^[24];笔者也主张,教学改革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以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促进学生的发展。只不过,改革有好有坏,有成功有失败。因此我们对改革的路线、方向,对改革的重点、难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任何对改革“亟待转向”的呼吁,目的都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为了让改革的方向从“歧途”回归“正途”,从“比较合适”变得“更加合适”,从而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进一步扫清障碍。

朱博士认为“课程改革是关涉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2],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因此改革更需要谨慎,更不能冒进。以“新课程改革”为例,仅仅是在“新课程理念”推行数年之后,社会各界就出现了“新课改推进速度太快”的批评声,就连《数学课程标准》的负责人也承认说,对改革“推进速度太快的批评,我们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能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实验与总结,许多方面的工作可能会做得更扎实、做得更好,也许问题就不会这么突出

了”^[25]。可见,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中,某些新理念、新观点的推进显得过于仓促,这也导致改革中存在着各种原本可以被避免的风险或者方向性的错误。事实上,这些风险在很多教师的反思、总结、教学日记,乃至学者的论文、调查报告当中早就有所体现了:有人呼吁警惕“生成性教学”可能引发的危机^[26];有人感慨“新课程,想说爱你不容易”^[27];还有一份2015年的调查报告,虽然只是一个地区的样本,但多少也说明了一些情况:超过20%的教师对新课程理念适应得并不好,而在近60%的适应良好的教师当中,绝大部分也是在“被动迁就”新课改^[28]……虽然也有不少调查认为一线教师对新课程理念总体上是接受的、认可的,但《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一文向我们揭示了:很多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所谓认同,只不过是“官方思想”“专家意见”给“挤兑”得说了假话而已,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29]。既然改革面临着如此众多的困境和不同的声音,“随便叫停”固然不可,但一味“坚守”也很难说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做的是直面问题、客观分析、找准原因、调整方案。因而,“转向”无疑是一个更加妥当的对策。

既云“转向”,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内容、清晰的方向,否则“转向”就可能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从前文的分析当中可知,当前一线教师已经被名目繁多的新理念所包围,却并不知道新理念应该怎么落实,从何处入手。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备课方案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经验总结,甚至不排除有媒体包装的可能^[30],很难说是系统研究的结论。而在学术界,技术方面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关注的焦点所在,比如教学语言的轻重缓急、班级人数的最佳容量、师生目光接触的频率和视野盲区、作业的难度大小和总量多少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还说不出的所以然来。在这种情况下,“转向”的方向自然应该是从“首重理念”到“更重技术”。笔者无意贬低理念的价值,恰恰相反,笔者非常认同朱博士所说的理念和技术的“推动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2],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只不过,双翼不能一大一小,两条腿也不该一长一短。既然目前的现状是关于教学技术的高质量研究严重缺乏,那么当然需要从片面关注理念转向更加重视技术。倘若有朝一日,教学实践中的状况是广大教师将各种技术都掌握得非常精湛,却苦于缺乏先进理念指引,也不排除笔者会提出“向理念转向”的可能。总之,“不以理念的革新为前提”^[2]的技术改良是朱博士对笔者的一个误解。笔者对给朱

博士造成这么一个误会表示抱歉,并在此澄清:笔者真正想表达的是教学改革应做到理念和技术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共同促进,而改革如果过分偏重于其中一方,以至于给实践带来了困惑,那就有“转向”的必要。

四、结 语

笔者以前的论文当中,从来没有“结语”这个部分;而朱博士和笔者商榷的三篇文章中^①,最后一部分都叫“结语”,用以总结全篇、升华主旨。三篇文章的“结语”都不长,但却总能给笔者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在此,笔者借鉴朱博士的这一写作“技术”,也用一段“结语”表达笔者的一些想法。

关于教学改革,学界原本就观点纷呈、主张各异。笔者和朱博士之间的纷争仅仅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但笔者很感谢朱博士。他和笔者商榷的每一篇文章虽难免个别言辞激烈,但却都能启迪笔者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考,修正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笔者想,良性的学术商榷意义大抵在此。只不过,关于当前的教学改革到底应该更重理念还是转向技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学术商榷却不能仅仅停留于“理念”层面的针锋相对和百家争鸣,而是还需要辨明是非、判断正误,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找到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如果我们在宣传某个理念、推进一项改革或者进行一次商榷之前,能够真正做到“认真倾听来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各种不同声音;通过数据分析来对改革进行严谨的、细致的论证;通过国家级、省级实验区的设置,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吸纳公众参与”^[2],能够更加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或许理论上的针锋相对就不会这么突出,理念的接受度也会更为广泛,改革的推进也会更加轻松、快捷!

注 释:

- ① 参见朱文辉博士的《戴着镣铐,何以能舞——〈反思与澄清:也谈教学的“预设”与“生成”〉读后感》,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3期《生成性教学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方法论——兼对周序博士的回应》,载《课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9期《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推广到技术提升的转向吗——兼与周序博士商榷》,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周 序.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中国教学改革亟待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4):63-67.

- [2]朱文辉.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推广到技术提升的转向吗——兼与周序博士商榷[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1):109-113.
- [3]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36.
- [4]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21-223.
- [5]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第2版)[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 [6]巴班斯基.论教学过程最优化(第2版)[M].吴文侃,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7]王 璞.“过时”的双基与“过激”的三维目标[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62-167.
- [8]俞正强.如何让学生认识“线无粗细”[J].中国教师,2015(3):59-60.
- [9]俞正强.种子课,埋下终身发展的种子[J].当代教育家,2016(9):56-57.
- [10]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83.
- [11]吴 原.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与教育创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75-81.
- [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3.
- [13]刘晓伟.情感教育,塑造更完整的人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7.
- [14]查有梁.课程改革的辩与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19.
- [15]周 正,温恒福.教师参与课程发展:调查与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09(7):73-78.
- [16]郭 华.评“教学回归生活世界”[J].教育学报,2005(1):17-26.
- [17]林俊华.让语文课堂教学回归“生活世界”之路[J].学周刊,2015(10):164.
- [18]罗惠文,冯文全.中小学数学教学“回归生活世界”误区种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37-39.
- [19]周 序.生成性教学:教学当中会出现一种新的方法论吗[J].课程·教材·教法,2015(4):44-50.
- [20]吕星宇.生成性教学的实践策略[J].教育科学,2008(3):37-41.
- [21]姜伯静.课改成功的希望不在老师身上[N].中国青年报,2007-08-02(2).
- [22]丰 捷,杨 光,孙献涛,戴自更.破解素质教育的难题[N].光明日报,2002-03-13(6).
- [23]保罗·基尔希纳,约翰·斯维勒,理查德·克拉克.为什么“少教不教”不管用——建构教学、发现教学、问题教学、体验教学和探究教学失败析因[J].钟丽佳,盛群力,译.开放教育研究,2015(2):16-29+55.
- [24]王策三.关于课程改革“方向”的争议[J].教育学报,2006(2):3-10+35.
- [25]储召生,赵小雅.对话义务教育数学新课标[N].中国教

- 育报 2005-06-01(3).
- [26]陈立全.重视“新”课堂的所谓“追求”[J].福建教育, 2004(6A):11-12.
- [27]夏祖瑞.新课程,想说爱你不容易[J].基础教育研究, 2002(11):19-21.
- [28]龙 兴.高中教师对新课程改革适应状况调查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 2015(22):55-58.
- [29]郭 华.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J].课程·教材·教法 2010(1):3-11.
- [30]山 子.新课程改革与考试指挥棒的关系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 2010(8):19-23.
- [28]龙 兴.高中教师对新课程改革适应状况调查研究[J].

A Second Argumentation on the Idea and Technique in Teaching Reform

—A Reply to the Discussion Launched by Zhu Wenhui

ZHOU Xu¹, LIU Qian²

(1. Research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Software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eaching technique are not external regulations or fixed procedures, but the abilities internalized in teachers, which can be acquired by imitating excellent teaching examples. Ideas need to be realized by technique, so whether i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test if the ideas are proper. If the ideas are too much ahead of the technique, they naturally lose the meaning of applicatio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es of scholars 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of ideas while neglecting to explore technique.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of technique becomes only the summary of scattered experience, which cannot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ideas. This urges a change in teaching reform, where people no longer apply ideas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echnique. Only in this way can ideas and technique be coordin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 teaching reform; teaching idea; teaching technique

(上接第 41 页)

[8]柏拉图.理想国[M]//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621, 400.

[9]Theognis. Book I[M]//Douglas E.Gerber.Greek Elegiac Poe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4-177.

Poetry and Enlightenment: a Study of Women Education in Archaic Greece from the Angle of Sappho

SHANG GUAN Jia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Poetess Sappho, “The Tenth Muse” called by Plato, had another important identity—teacher. Sappho’s “circle” showed the basic model of women education in ancient Greek. The goal of Sappho’s education was to cultivate “beautiful bride”, the main contents of teaching were poetry which set “poems, music and dance” in one. The authority of poetry was from the Olympians gods. Greek people believed these poets gained the grace of the gods. The teaching model of Sappho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women education of ancient Greek.

Key words: Sappho; poetry; Archaic Greece; women education